

(Adam Smith)一樣的自由放任的市場，而更類似於一種壟斷性質的邊地貿易形式。雖然他想要從世界市場形成的角度反思南疆的近代歷史，但毫無疑問，絕大多數當地的農產品的消費者是當地駐防的清軍，文中並未充份展示南疆與更廣闊的世界市場的聯繫。其次，金光明認為清代新疆的資本主義發展取得較高成就，遠距離貿易相當可觀。但從清代相關材料來看和浩罕、哈薩克等的貿易政治性更強，絹馬貿易等繁榮的時間相對短暫，數量也逐漸平穩回落。因此我們需要謹慎地對待清代新疆商業的發展規模和商品流通情況。金光明認為南疆地區發生的一系列和卓後裔的戰爭與社會矛盾和伯克的經濟活動有關，在社會矛盾的經濟成因裡，城鄉對叛亂回應的不同這一結論仍需要更充份的史料印證。最後，筆者認為本書中的觀點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如書中第一章認為明朝朝貢貿易的中斷與葉爾羌汗國的衰落關係密切，筆者認為這一論斷缺乏足夠的史料支撐，文中並沒有全面分析朝貢貿易在葉爾羌汗國對外經濟貿易中比重，亦未分析葉爾羌汗國末期與明朝朝貢貿易的頻次和規模的變化。

趙佳文、張莉

陝西師範大學西部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By DI W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60 pp.**

微觀史家將研究視角置於歷史進程中的小群體與個人，並以細微的研究對象入手而觀更為宏觀的歷史軌跡。王笛的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一書便是一部微觀史觀的論著，該書聚焦於1940年代成都平原裡的一個袍哥家庭——雷明遠之家，研究雷氏家庭的興起與衰落、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與鄉村的聯繫等。作者更試圖從一個家庭的生命史延伸至1940年代前後整個川西平原的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從而進一步了解對四川地區影響最為深遠的秘密社會組織「袍哥」的發展與沒落。

本書除緒言外，共分為四個部份，內含12個章節。書中所圍繞的主要史料是沈寶媛所撰寫的社會調查——《一個農村社團家庭》。在緒言部份，作

者便表明該書展現了兩種不同聲音的匯集：一是關於這份社會調查中的故事本身，即是袍哥首領雷明遠和他的家庭之興衰與生活軌跡；二是社會調查的撰寫者沈寶媛，以及她背後所反映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整個學術脈絡。該部份總結清末至解放時期關於秘密社團的過往研究成果，並梳理20世紀初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術發展趨勢。最後通過引用沈寶媛報告的部份內容，了解她調查袍哥家庭的動機，為之後論述袍哥在鄉村的作用與情形，以及沈、雷二者的故事提供了基礎背景介紹。

第一部份以一場公開處刑為開端，描述袍哥首領雷明遠因謠言處死自己女兒的故事。1939年的這個故事展示袍哥首領忽視國家法律，在農村社會動用「私刑」的情形。要理解這場悲劇背後雷明遠的動機與心理，以及他在地方的權力來源，便需要考察袍哥組織的背景，還有雷氏家庭所在的确切地點。作者考據袍哥組織為何能夠維持數百年來的活躍，並對地方社會擁有一定的掌控能力。清末至民國時期，袍哥並不像其他一些秘密社團被摧毀，它們適應着各個時段的不同背景而愈發強大。1911年許多袍哥成員參與進「保路運動」中，使得該團體從隱蔽走向公開。袍哥內部的成員始於底層人士，後隨着影響擴大又開始與各個階層產生關聯。在此之下，地方的官府既沒有足夠的力量擊垮它們，在地方動蕩的時期反而需要他們幫忙收取民眾的稅收，成為政府與大眾之間的紐帶。

除了政府干預的力量薄弱外，袍哥組織長期興盛還與他們內部一套系統的習俗、儀式、暗語有關。在本書的第二部份中，作者向我們展示袍哥組織的內部世界，他們的暗語、「吃講茶」、解決基層糾紛的方式等。在這裡作者想要說明的是對於基層社會而言，「袍哥」並不是一個「破壞者」的角色，他反而是基層秩序的「維護者」。所以人們很難想像街道、村落沒有「袍哥」的情形，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數百年來一直存在。

第三部份講述雷明遠家庭的興起與衰落。雷明遠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個以農業養家糊口的佃農；同時，他也是一位擁有追隨者的袍哥首領，在地方事務上擁有一定的話語權。20世紀初川西平原動蕩之時，袍哥組織抵禦土匪侵犯而成為當地的英雄(Local heroic figures)，雷明遠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正因為雷明遠的雙重身份，使得其既需要擔負家庭責任，也需要進行維持袍哥首領聲望的一系列社交活動。因為注重作為袍哥首領的「面子」、聲譽與形象，雷明遠四處旅行會見其他袍哥首領，也致力於宴請客人。值得注意的是，袍哥的力量是與經濟能力息息相關的。當雷明遠愈發無力支付龐大的開支後，他還面對着富有的新佃農蔡氏家庭的出現。後來，各

種細微事件導致雷明遠自身權威的愈發衰退，我們看到曾經叱吒風雲的袍哥首領雷明遠的黃金時代也逐漸步入了終焉。

第四部份包括了第10至12章，共計三個章節。第10章節講述袍哥團體的沒落與消亡，該章節作者以三個地區袍哥組織的故事為線索，展示1949年共產黨政權成立後「袍哥」的不同命運。1949年後，大部份的袍哥首領受到懲罰，能夠倖存下來的主要有三類人士：一是袍哥組織中的底層成員，他們被認為是「受壓迫的人」而得以生存；二是與共產黨有較為緊密關係的人員；三是沒有犯過罪孽的袍哥首領。在之後中國的多場動蕩運動中，又有許多因為袍哥身份出事的人士，而與雷明遠同在「望鎮」（成都崇義橋）的蔡興華作為與共產黨關係緊密的袍哥成員得以繼續倖免。不同於蔡氏的故事，1949年之後大部份袍哥成員的命運皆不甚樂觀，如金堂地區的賀松便在1950年被公開處死。崇義橋地區旁邊的新繁地區，在解放軍接手後，當地袍哥因為共產黨的「徵糧」舉動而進行新的反抗，之後很快便被鎮壓，許多成員皆被處死。有研究認為，共產黨接管鄉村的過程是極為順利的「和平解放」，然而新繁地區袍哥組織的消亡則為我們展示另外的一種圖景。

川西平原袍哥的故事進入了尾聲，不過該書敘述的故事仍未結束。在第11章中，作者深入探析沈寶媛的學術、教育背景。沈寶媛是受左翼思想、西方社會學理論影響的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沈氏調查袍哥首領雷明遠家庭的動機，是與這些社會、文化背景有所關聯的。不過可貴的是，她對雷氏的調查並沒有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態度。身為本科生的沈寶媛對於社會學學術理論的運用仍顯青澀。如此一來，《一個農村社團家庭》一文雖然不是成熟的學術論文，但卻是更為真實的歷史資料。著述的最後，作者認為從更為廣泛的角度來看，袍哥內部一些高深莫測的暗語成為了四川當地流行的文化之一。袍哥的肉身雖然消亡，但它的文化與靈魂在新政權建立後卻得以留存。

在資料運用方面，書籍的第四部份描述「袍哥」在1949年後的衰亡史，但因為史料的局限，作者無法了解雷明遠在1949年後的生活。不過沈寶媛的《一個農村社團家庭》作為該書運用的核心材料，這種運用社會調查作為史料的做法，其突破之處在於展現地方政府所記載外的另一種袍哥故事。受偏見所影響，地方官員與知識分子筆下的袍哥形象常被描述為犯罪者。他們認為這些被視為威脅社會安定的團體在1949年共產黨新政權進入後徹底被摧毀。然而雷明遠家族的衰弱，卻是因本身的經濟危機所致。

該書展現三個層次的視角，除了調查者沈寶媛、袍哥首領雷明遠二者的故事外，最後一個層面則是使用資料的人，也就是書籍的作者本身，他向我

們展示現在的史料使用者如何與過去的書寫者進行對話。作者清晰地認識到若僅將沈寶媛的社會調查作為史料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此份調查雖詳細地描述袍哥雷明遠家庭的日常生活、社會活動，但缺乏對整個川西平原農村社會背景的了解。所以作者還使用文史資料、政府檔案等其他資料，再現並完善袍哥的歷史與文化，以及袍哥的起源，他們內部的暗語、信仰與儀式等內容。本書既為讀者深刻展示四川地區「袍哥」的故事，又為我們很好地演示運用社會調查作為史料研究的方法。

郭燁佳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鄉村社會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476頁。

《明清兩湖地區鄉村社會史論》一書收錄楊國安常年從事鄉村社會史研究共計16篇文章，涉及土地、稅收與賦役制度，保甲、團練與社會控制體系，水利糾紛與用水秩序，移民、生計與宗族管理等內容。作者長期耕耘於兩湖地區，這些亦是其在長時段研究中陸續而作。正如其在後記中言，其背後的學術理路在於：「從國家權力與民間社會互動兩個視角，同時觀察官府對鄉村社會的管控與治理，及鄉村社會自我管理與民間社會的自我構建。」（頁478）本書的實證研究為我們理解兩湖社會變遷、思考國家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寶貴借鑒，從中亦可管窺兩湖地區的某些地域性特點。

為更好體現本書內涵，筆者將不按照目錄的編排順序，而從學術理路出發來評介其內容。至於前言，因與全書主要理路不同，而據註腳年份判斷，當知作於本書定稿之際，故放在最後討論。

本書末篇〈長江中游鄉村社會權力結構及其變遷（1368-1911）〉發表於2006年，從里甲與保甲、族權與王權、士紳與團練等方面討論長江中游鄉村社會權力結構及其變遷，涉及國家制度和基層管理兩個層面。書中在此之前發表的文章僅三篇，其他各篇大抵沿此篇思路展開。因此，筆者將以此文為基本線索，同時穿插介紹所涉篇章，重復內容從略。

此文篇首，作者拋出縣以下的鄉村基層權力結構問題。傳統中國鄉村社會高度分散，因缺乏足夠資源管理鄉村，國家對廣大鄉村只能實施「間接管